

清末至民国时期重庆各地乡土志 的纺织服装业资料研究

邹涛 周媛袁¹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摘要】: 乡土志是清末至民国时期乡土教育的教材,其涵盖的信息丰富而全面。当时重庆成书的乡土志数量较多、信息量大、质量较高,是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重庆纺织服装业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重庆各地乡土志中纺织服装业的相关信息直观呈现了当时重庆此产业原材料种类、生产加工详情和贸易概况,其研究价值颇高。这种以乡土志为基本材料,开展区域产业经济研究,既可为此类研究提供思路和方法,还可为其他方面,诸如艺术、文化、民族等主题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纺织服装业 乡土志 清末 民国 重庆

【中图分类号】: F429. 1/. 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99(2019)04—0058—08

乡土志是晚清政府为挽救民族危亡、培养民众爱国、爱乡情怀而在教育改革中推行的用于乡土教育的教材,所编内容主要依据各地旧方志,又在其基础上增加了当时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民国时期,我国仍处在内外交困的艰难时局,国民政府延续清末教育改革举措,继续编撰和使用乡土志,推行乡土教育。重庆虽然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仍属于四川省,但从被定为首批通商口岸之一的城市到成为民国时期的战时陪都,无不显示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时期,重庆也响应当局号召,积极编撰乡土志,基本成书共约16种,分别为:光绪年间的10种,即巴县乡土志二卷、铜梁县乡土志、黔江县乡土志、涪乘启新(亦名涪州小学乡土地理)、巫山县乡土志、江津县乡土志、南川县乡土志、云阳县乡土志、石柱厅乡土志、江北厅乡土志;民国时期的6种,即重庆乡土志、巴县乡土地理表、垫江乡土志、万县乡土志、丰都县乡土志、忠县乡土志。据统计,当时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省编撰的乡土志共约71种,而重庆各地乡土志数量就占整个四川省所编乡土志总数的22.5%,此比例是比较大的,足见重庆对乡土志编撰和乡土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该时期重庆各地的乡土志记载了当时重庆的地理、物产、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情况,是研究近代重庆的重要参考资料。纺织服装业是重庆的传统产业,也是当时重庆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因此,该时期重庆各地的乡土志大多都对此有所记录。本文通过梳理该时期重庆各地乡土志中的纺织服装业相关资料,以此为据剖析当时重庆该产业的基本情况和态势,从而发掘乡土志在历史时期区域产业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一、直观呈现纺织服装材料种类及其生产加工情况

纺织服装产业是中国最古老、最典型的产业之一,政府历来对此尤为重视。因此,该产业的相关情况必定会成为培养国民爱国、爱乡情怀的乡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各地纺织服装的各类信息则也被相应被列为乡土志的编撰内容。诚然,重庆各地的乡土志中也有纺织服装产业的相关信息,主要包括丝、麻、棉和夏布等的生产加工和地理分布情况,也包括皮料和皮革服装、染

¹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研究(1905—1949)”(2015BS110)。

作者简介:邹涛,女,四川达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地方经济史、乡土志。

周媛袁,女,重庆渝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经济史、乡土志。

料等生产经营情况,还涉及衣服、鞋帽、领袖、冠饰等服饰的生产销售情况。

(一) 纺织品

巴蜀地区的纺织业历史悠秀,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种植的纺织原料和生产的纺织品种类较为丰富。重庆各县乡土志大多都在“物产”部分记载了本地的布料种类及其原材料。如《云阳乡土志》的“植物天然产”中就记载了本地有桑、棉、葛、麻几种纤维,继而在“制造产”中又录入了棉布、绒巾、棉带、丝带、丝线、绉绢等面料。^{[1]402}足见纺织业是该县非常重要的产业。就整个重庆而言,麻的种植和生产销售颇为普遍,因此这是该地乡土志的重要内容,如《石柱厅乡土志》载:“麻,俗名火麻,言其众长棚生协茂同荣也。《异物志》云‘外土出麻,织布火焚如浣,厅产较苕粗大而劲,惟作绳及编履用’。”^{[2]453}此乡土志对麻的名称和生长特点做了简介,进而引用文献说明本地麻基于其特点而产生的用途。有的乡土志对麻的介绍甚为详尽,如《江津县乡土志》载:“一曰麻,体质坚韧,妇女派绩成纱,漂白织夏布,彩染五色,行销甚广,又兼用丝提织花布,并可纺线,渔户用以结网。一曰葛,亦可绩纱织布,与麻同功,但不及麻出产之多。”^{[3]102}该乡土志提到了“麻”的特性、用途和销售情况,尤其谈到此地的麻可以织造成夏布和提花布,还可以做渔网,可见江津的麻质量高、用途广。夏布是重庆非常富有特色的传统布料,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是重要的服装面料,《铜梁县乡土志》就记有“夏布,自荣昌陆运行入境,岁销银约以千计。”^{[4]682}这说明夏布主要由荣昌运入重庆境内销售,且销量较高,夏布则成为了荣昌的特色商品。现今,重庆荣昌夏布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有力的史料依据。麻的种类较多,苧就是其一,《铜梁县乡土志》就记载了此纺织材料的种植、生产和用途情况:“苧,古作紵一科,数十茎,一孕数千穗,宿耕在土,春来自生,绩皮为布,可作夏服”^{[4]619}。《石柱厅乡土志》也对此类麻做了记录:“苧,苧苗高六七尺,叶如楮,或青或紫,背白有短毛,宿根在土,春来自生花,青如白杨而长,夏秋间垂细穗,白色子熟茶褐色,剥其皮绩可为布,供夏服,厅人制绪末精,祇织粗布用耳。”^[2]该乡土志谈到了麻的高度、树叶、色彩等植物性特点,讲到了它的种植方法简单,只需要“宿耕在土,春来自生”,夏秋之际结穗产子就表示其茎皮成熟,即可织布了;而石柱厅居民只将此麻织造夏服或者粗布,足见该地的苧麻质量平平。

蜀锦作为一种高档丝绸,从古至今都是巴蜀特产,丝的产量和质量是保障蜀锦生产水平的材料基础,但清末至民国时期重庆各地丝的产量和质量情况不一,有的地方产量大、质量好、销量高,但有的地方却明显落后,这充分体现该时期在重庆各地的乡土志中。《南川县乡土志》非常清晰地解释了桑蚕业的基本原料桑:“树高大,有女桑、椶桑、槩⁽¹⁾桑、山桑、鸡桑、于桑、鲁桑、荆桑之不同,其叶均可饲蚕。”^{[5]129}这里表明了桑的植物性特征,尤其可贵的是讲到的桑的种类较多。而《铜梁县乡土志》提到了“以蚕茧置釜沸水中,挑出丝头,搭釜旁,木车铁丝纽上纴即出成丝,出安居诸场(大宗之一)”^{[4]619}这里指出了本地丝的生产方法,产地为“安居诸场”,以及表明了丝在本地商业产品中所处的地位是“大宗之一”。而《江北厅乡土志》也记有:“丝,本境前数十年养蚕者颇少,自同治癸酉川东道姚公覲元始劝民间养蚕,复为购佳种嘉桑,分播道属。于是厅民乃知蚕利,渐植渐多,复开通农政,劝种益繁。大凡自业者几余无不种桑养蚕,虽每家出丝多寡不等,亦商务之发达。”^{[6]106}清末,江北厅丝的生产情况本来并不乐观,但川东道姚公覲元规劝本地居民购买品种好的桑树,致使种桑养蚕所得利润丰厚,大大促进了丝的生产和营销。石柱县就不及铜梁县和江北厅了,该地乡土志记载“丝,旧志云‘厅民向少蚕桑,近有以饲蚕获利者日增月盛,利益薄矣,分生丝、熟丝,黄白二色,然不及别境之韧软,利用近大河嘴场,有织绸帛者,价虽廉而粗丝之逊也。’”^[2]该乡土志据该县旧志表明,石柱县的老百姓种桑养蚕的较少,而且此县生产的丝的品质不及其他地方的好,因此用其所织造的丝绸价格也不高。该时期重庆各地的乡土志所载有关丝的生产情况,足以证明当时重庆丝织业总体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

棉花、棉布是该时期本地区乡土志所记载的又一重要纺织品,但记载得并不多,说明当时该地区棉花种植非常有限。其中,《云阳乡土志》在其“植物天然产”中仅提到“棉”,此外就无更详细的介绍了。《铜梁县乡土志》关于棉花的记载稍微详细一点:“棉,茎高数尺,结实吐绒,如丝抽韧,不及洋棉而温暖过之,纺织成布,叶可饲畜,子可榨油。”^{[4]642}该乡土志不仅介绍了棉花的植物特征和生产情况,还谈到其质量和用途。《江津县乡土志》记录的是棉花织造棉布,“以棉花弹制成条,妇女车纺为线,造布匹,渲染青蓝各色,供制衣服,但本境不产棉花,均由湖广水道运来。”^{[3]105-106}该乡土志说到该地老百姓用棉花做成棉线,织造棉布,再染成蓝色、做成衣服;同时,也提到本地不产棉花,而是湖广一带经由水道运输而来,足见该地的棉纺织业并不发达。另有一些乡土志也记载了棉花棉布的情况,但大多都表明此纺织材料的生产技术落后,产量和质量都不高。

(二) 皮料和皮革服装

裘这种皮革服装是当时非常高档的冬季生活用品,重庆各县乡土志中有关“裘”的记载较多,共约20处。据该地区乡土志记载,当时重庆用于制作“裘”的原材料主要来自羊、狐、狸、兔、雉、兔、麝、貂鼠、鼯鼠等动物的皮毛。其中,用狐、狸的皮毛制作裘的情况最为普遍。《江津县乡土志》就载:“一曰狐,其皮销为裘,集其腋名狐腋,集其狐肱名狐肱,毛最轻暖,为服中珍品(白者难得,津产有黄黑二种。一曰狸,一种名野猫,毛杂黄黑,斑文如虎,作连钱形,其皮可制为裘”^{[3]92}。又如《石柱厅乡土志》记:“狐:狐高不满尺,长二三尺,嘴尖耳小,尾丰毛厚,昼藏夜出,死则首丘,性多疑善媚,故有狐疑狐媚之喻,其皮毛可为裘,《论语·乡党篇》:‘狐貉之厚,以居白者最佳,称狐白裘。狸:貉俗呼野猫,大小如狐,毛杂黄黑,有斑如猫,而圆头大尾者曰猫狸,尖头方口者为虎狸,似虎狸,而尾有黑白钱文相间者为九节狸,有文如豹而作麝香气者为香狸,均可口,而皮毛能作裘。”^{[2]437-438}此乡土志对狐和狸的身体特征、种类记载非常详细,重点在于二者都可做裘,是上乘的皮革面料。此乡土志还记载了品质更好的皮料:“貂鼠,水狼之属较大于鼠,有灰紫两种,紫者佳,其皮毛为裘,极珍贵,今内外官非三品不得服貂”、“鼯鼠,《尔雅》谓夷由项脊毛紫赤色,食火烟,一名火狐,出口外者,可为裘”^{[2]438},水狼的灰紫色两种色彩的皮毛都可以做裘,且“极珍贵”;而火狐的皮毛则出口之后做成裘,这充分说明物产丰富的石柱厅所产的皮料种类多、质量高,是做裘的重要原料。当然,除了前述狐、狸、鼯鼠等动物外,也可将家畜羊的皮毛做裘,《垫江县乡土志》就曰:“羊皮,多售之渝,硝去生性,缀之为裘”^{[7]1}。值得一提的是,原本重庆本地民众没有利用的动物皮毛被外国人购买去加工成高档面料,其中,《江津县乡土志》就载:“一曰兔,毛杂青黑色,一种绿头黄翼,西人取其毛,织绒制裘,滑泽华丽,名兔裘。按:此说出于小说家,亦属奇技淫巧,略之所鄙,然津产野鸭,大江最多,每出则千百成群,聚集洲上,用枪取之,每一发即中者多至十余只,是取之甚易,如能仿西法制绒,亦可辅鸡鸭毛之所不及。”^{[3]105-106}。原本国人不能将兔的毛做成裘,但西方外国人则将之织成绒,再做成裘。此类情况在重庆的其他各县乡土志中也有一定的记载,由此可见,当时我国的面料织造技术是落后于西方国家的。而该乡土志在按语中呼吁:江津的兔很多,捕捉也非常容易,应该仿照西方的生产技术将其毛制成绒。这里表明当时江津部分民众已经有了比较开明的意识,勇于承认落后,也敢于向西方学习先进纺织加工技术。

(三) 染料

丝麻棉等纺织材料的本色是非常单调的,因此要用染料对其染色,加以美化。当时重庆各地生产的主要染料是蓝靛,该时期重庆的忠县、铜梁县、巴县、万县、垫江、石柱厅等六个县厅都对此有所记载,这大致表明了重庆蓝靛的种植分布情况。其中,《巴县乡土地理表》整体编撰简洁,仅仅提到该地有此染料,而《铜梁县乡土志》对此的记录就比较详细:“靛草,叶青梗赤,不花不实,以枝栽土即生,渍叶化汁可以作染,产东西山,近年六寅山亦盛。”^{[4]641-642}这里不仅谈及靛草的植物特性,而且还提到了本县靛草的种植分布及其变化情况。与此记载方式相似的还有《忠县乡土志》等,此不再赘述。《垫江县乡土志》以“蓝靛,伏日一刈,秋后再刈,筑石灰池,用水之嫩叶腐烂,质如涂泥,此染色大宗”^{[7]11}对蓝靛加工成染料的方法进行了简单说明,《铜梁县乡土志》和《万县乡土志》也有类似叙述。与这些乡土志不同的是,《万县乡土志》则对靛草的记载相当细致:“蓝,《通志》蓝三种,蓼蓝染绿,大蓝染碧,槐蓝染青,三蓝皆可作淀色成胜母,故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诗《终朝采蓝》注染青草也。本境产者俗呼为蓝子,以之作靛。当是槐蓝一种,每斤值钱十五六文,岁产数万斤,制靛者争市,行销利川三带。”^{[8]5}此文涉及靛草的种类、所染色彩、价格、利润和销售额及地点等情况,史料价值颇高。蓝靛是最重要的传统植物染料,由重庆的乡土志可知,重庆主要区县都种植了该染料,说明蓝靛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它是该时期重庆地区重要的纺织品加工材料。

(四) 服装

重庆各地的乡土志不仅记载了此地出产的各类纺织品,而且还记录了纺织材料做成的服装种类,主要包括服装及其领袖、鞋靴、头饰品等。首先,重庆各地乡土志大多都是在记录物产时提到某物产适合做成服装,如《江北厅乡土志》就记有:“猿,有金线、通臂、长尾数种,桶井峡多有之,皮可制为服。”^{[6]183}即在说明某动物物产情况时顺便讲明此动物的皮毛可以做成服装,而不是具体记载服装的款式、结构、色彩和工艺等详细情况,此种情况在重庆各地的乡土志中较为普遍,在此就不一一呈述了。其次,有的乡土志说明了某些动物皮毛制作服装的领袖这一情况,《江津县乡土志》就提到了两种动物的皮毛可以制作领袖,“一曰兔,

津产有家兔、野兔两种，野兔毛细软，制领袖，制笔（但须冬令获者，方可用，若春夏之皮，则脆弱不适于用）^{[3]91-92}，这里不仅说到兔毛可以做服装的领袖，还可以制成毛笔，且解释了不同季节兔毛的特点，即冬天的毛才更佳，春夏时期兔子的皮毛脆弱而不适用；又记“一曰竹，其毛白箭如银丝，颇银鼠，其皮软韧，可销为领袖”^{[3]106}，这也表明竹的皮毛像银丝一样漂亮，质地类似银鼠的皮毛，也可以做成服装的领袖。与江津不同的是，垫江制作领袖的材料是獭。《垫江县乡土志》曰：“獭，售之皮，工揉硝薰色，以为冠领袖盖之饰”^{[7]2}，这说明獭的皮毛是该县制作帽子领袖的原材料。不管是兔和竹、还是獭的皮毛做的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紧贴肌肤的领袖要求亲肤柔软的舒适度、经久耐用的实用性以及色彩淡雅的美观性。再次，鞋靴的种类、材料和制作等情况。麻鞋是非常普通普遍而实用的一种鞋，《铜梁县乡土志》就载：“麻鞋，竹麻编成，精致如鞋，俗名麻窝子，出二郎、人和两场”^{[4]659}，这里既说明了麻鞋的原材料是竹麻，而且还提到了其主要产地。关于麻鞋的材料，《江津县乡土志》在记录物产时提到“慈竹，产有泡慈、铁心慈二种，六七月生，笋味微苦涩，以水澄一二日亦可食，籐制鞋底”^{[3]100}，这里指出慈竹是鞋底的原材料。麻鞋和竹底鞋都是穿起来较为凉爽的鞋子，与此类似的还有《垫江县乡土志》提到的“马，尾可作拂子，制凉鞋、凉帽、面节等用”^{[7]2}，即马尾也可做凉鞋。记录了靴子的制作原料情况的主要是《江津县乡土志》和《南川县乡土志》，前者载“一曰鞋靴，分纺缎、阿绒、洋缎、棉布，各项均属青色，惟鞋有用大呢，并以湖摹本间色兼制，名曰扎花，多在县城制造，各乡销行，每岁约计值银五六千两”^{[3]107}，这说明江津县的靴子原材料是大呢，在县城制造后销往该县各乡，利润还颇为丰厚；后者所提制靴的材料是牛皮，“本境牛皮虽非大宗，然岁出亦颇不少，约值数千金，土人多取以制成熟皮，作为靴鞋之用，然本境仅用十之三四生革，售外者居六七马”^{[5]130}，可见，南川县牛皮做鞋获取的利润也较为可观。

非常难得的是，重庆各地的乡土志记录了一些有关冠饰如簪珥、钿等的资料。冠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动物羽毛做的冠饰，《垫江县乡土志》载：“鱼虎，俗呼打鱼雀，翠羽用贴妇女首饰”^{[7]2}，据查，垫江县用于制作冠饰的材料仅为打鱼雀的羽毛，较为单一。记录得同样简单的是《巫山县乡土志》中的“雉，有多彩…(制造)吕尾长作冠饰”^[9]。而《江津县乡土志》相对较丰富，提到了三种动物：“雉”、“翠”、“子雀”，它们的羽毛均可制作冠饰。如“翠，其毛羽华美可观，制屏风、冠饰、簪珥，贵重异常，古人有以为被者，津产不多，猎户以网戈，取拨其毛，即行释放，以求二次再拨，盖恐伤命绝种难再得也”^{[3]93}，“翠”的羽毛非常华美，可以制作屏风、冠饰、簪珥，价值昂贵，所以捕猎者对其是小心翼翼、爱护有加。这类制作首饰的原材料主要是鸟儿的羽毛，因其色彩艳丽，极富装饰性，所以被用于制造冠饰。另一类是金属类首饰，此类首饰的记载不多，仅见于《江津县乡土志》，其中写道：“首饰，多以银制造，用金较少，概属妇女妆饰，所制诸品名目繁多，在城乡销行(通县皆有制造铺家)，每岁约计值银四五万两”^{[3]108}，此文表明该县的头饰主要用银制作而成，用金制造的首饰较少，而制作银饰的商铺是遍布全县，且种类丰富，每年所获利润较高。由此可见，银饰是江津的特色商品，而其他各县乡土志都没提及金属饰品，说明当时地处偏远的重庆经济文化整体水平还不够高，但江津却能独树一帜。

二、清晰反映纺织服装经济的贸易情况

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除了原材料的加工生产外，其销售路线、销售市场、销售额等贸易情况也非常重要，它体现了一个区域历史时期总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这也必将成为乡土教育和乡土志编撰的重要内容。重庆各地乡土志中纺织服装产业贸易情况的信息比较丰富，能比较清晰地反映本地纺织服装品的经济贸易状况，颇具研究价值。具体而言，重庆各地乡土志中的纺织服装产业贸易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详细呈现纺织服装业经济贸易的基本情况

在重庆各地的乡土志中，纺织服装经济的贸易情况主要涉及纺织服装材料及其加工品的出产地、销售市场、销售量、销售路线和销售金额等基本信息。该时期此区域的乡土志虽然对这些信息的编撰风格和格式基本相同，个别略有差异，但资料性都是非常突出的。如《巫山县乡土志》在“物产类”提到了本地蚕吐的黄白两种丝线可以做绫罗绸缎后，又在“商务”中谈到“蚕丝”的销售情况：“木棉、麻、葛等物邑产无多，惟之供本境本乡需用，不能贩运出境售卖。”^[9]又如《铜梁县乡土志》在“商务”部分以“本地物品”“入境物品”“出境物品”三个方面呈现相关信息，其中本地物品列了两项：

靛,出东西山、六寅山,岁计银约五六千不等。

竹麻鞋,出水口、二郎等场,岁计银约千余两。^{[4]672、675}

这里仅记载了重庆铜梁蓝靛和竹麻鞋的出产地和销售额,可以见证该地此二类商品的产地范围有限,所获利润较薄。与此不同的是,该乡土志“商务”中的“出境物品”和“入境物品”则更突出销售路线和销售额:

【出境物品】

黄花布,出平滩场,陆运行云贵,水运行渝郡、涪州,岁入银约十万余两。

棉辫线,云城乡各场,陆运云川南北,岁入银约以千计。

羊皮,本境常产,水运出重洋,岁入银约以千计。

竹麻鞋,出水口、二郎诸场,陆运行邻封州县,岁入银约千余两。

蚕丝,安居诸场特盛,陆运行璧山、合州、渝郡、成都,岁入银约计二万两。

【入境物品】

棉花,自渝郡陆运入境,岁销银约以万计。

洋纱,自湖北水运入境,岁销银约十万上下。

绸缎,自成都渝郡陆运入境,岁销银约万余两。

夏布,自荣昌陆运行入境,岁销银约以千计。

羔裘,出云贵陆运入境,岁销银约千余两。^{[4]677-682}

从此文可以看出,重庆铜梁的出境纺织服装品主要通过陆路和水路运往周边各县和成都,其中棉辫线还陆运到外国;而该县的入境纺织服装品也是这样由湖北、云贵、成都等周边省市运入境内。就营销额看,该县的黄花布是本地盈利的大宗商品,每年营销利润达十万两以上白银,居本地纺织服装产品营销额的前列。在入境商品中,洋纱的利润额最高,也达十万上下两白银,这表明当时铜梁纺织业受外洋纺织业的侵袭是比较严重的。《万县乡土志》、《江北厅乡土志》、《石柱厅乡土志》等重庆的乡土志也囊括了以上类似信息,且编撰方式也相似,由此可了解当时重庆这些区县纺织服装产品的基本销售情况。

同时,通过比较重庆各县乡土志中同一纺织服装品的销售信息,又可以看出当时重庆纺织服装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推断重庆此产业的基本发展态势。以棉花、棉布等棉货为例,清末的《南川县乡土志》、《石柱厅乡土志》、《江北厅乡土志》、《江津县乡土志》、《云阳乡土志》和民国的《万县乡土志》、《垫江县乡土志》等或多或少对此纺织品有所记载,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

《南川县乡土志》:棉货,由湖北水运入境,纺织布匹每岁约销数万斤。^{[5]131}

《石柱厅乡土志》：棉花，棉花轻暖甲全球，昔为广棉价钱，所夺鲜有种者，祇就本境销行，岁不过数千余金。布，先年土棉所织之布，名家机布，现概织洋矣，在本境销行岁约数万匹，分蓝白布行，白多蓝少，其自河外来售者，岁约值数千金。^{[2]65、67}

《万县乡土志》：棉纱，产外洋者十之六，产湖北官纱局制者十之四，每天大包三百二十斤，价七八十两，每年约销七八千包，均由水运入境，可售银五六千万两，除本地坐销外，陆运销梁山、新宁、大竹、绥一带，水运至重庆分销。棉花，本产土花无多，不能出境，其广花由湖北水运入境者，每包一百五十斤价二十两内外年销万余包，约售银一二十万两，除本地坐销外由水陆分运出境。^{[8]4}

《垫江县乡土志》：棉花，自万县、长寿运至，岁销约值银五万余两。^{[7]12}

从以上信息可知，南川县、石柱厅、万县这三个地方的棉纺织品货物销售来源主要依赖于外省和外洋的棉纺织品。其中，南川县和万县的棉纺织品主要来自湖北省，说明当时湖北的棉纺织业较重庆的更发达，加之其地理位置与重庆毗邻，因此，湖北成为了重庆棉纺织品的主要进货地。石柱厅十分之六的棉纱来自外洋，此比例相当高，这表明当时国外的棉纺织业已经严重威胁到重庆部分区域的棉纺织业的发展，殖民经济的特色透露无疑。而垫江县棉花几乎完全依赖外地进口，进口地主要是近邻万县和长寿，这充分证实了当时重庆棉花生产的地域差异。

《江津县乡土志》的记载内容最为丰富，不仅记录的棉纺织品种类较多，而且每种纺织品的信息都比较详细，尤其是销售路线更具体。

一曰棉布、洋纱布，运出本境，陆路在贵州桐梓、遵义，水道在嘉定、叙府、合州等处销行，每岁约计值银三四十万两。

一曰夏布，由水道运出本境，在重庆府、涪州、湖北、宜昌、汉口等处销行，每岁约计值银四五万两。

一曰棉花，多由湖北沙市江口里河家乡新州黄州水道运来，在县城油溪吴滩（均思里九都），白沙（笋里十一都），石门（思里七都），朱家沱（思里五都），李市镇（笋里八都），五福场（杜里三都），仁沱场、珞璜场（均杜里六都）等处销行，每岁约计万包（每包约值银四十两内外）之谱。^{[3]108-110}

与众不同的是，《云阳乡土志》采用了比较直观简洁的表格，能一目了然地看到该县本地土货、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中纺织品的产地、运输途径和交易额等基本情况。

云阳县进口棉布的营销额是十余万两，而本地生产棉布的营销额是一万两，足见其棉纺织业基本完全受制于外地，而本地不销售毛货、皮货，此二类产品业基本来自外地，足见当时云阳县该行业发展的艰难。而值得庆幸的是其他纺织品虽然本地营销额不高，但还艰难地保持了主导地位。

尽管以上两种呈现形式不同，但从其信息可知，重庆各区县的棉花、棉布、棉纱是最主要的棉纺织品，其中非常特别是江津县产夏布，并且销售范围较广，包括重庆府、涪州、湖北、宜昌、汉口等地，与其他纺织品相比，其销量还不错，每年利润达四五万两白银。而当时的石柱、万县、江津都销售棉花，其中江津的销售额也最高，达四十万两白银，足见当时江津县的棉纺织业相对较为发达。

（二）不同程度表现纺织服装业的销售困难

近代重庆纺织业发展步履维艰，在销售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如《江津县乡土志》就载：“羊皮取原质晾干可为坐卧褥子，销之可为裘，名曰土货（不如打箭炉及陕甘等产之佳），冗毛用织毡毯，但不如西人制造之精。”，又载“一曰獭，其皮毛光滑，青黑色，销

制领袖皮裤(惟州人不知销法,必须寄往湖北销回,始合于用)。”^{[3]91,92}此文首先说明羊皮的用途是可做褥子,也可为裘,但其质量既不如打箭炉及陕甘等地所产的质量好,织造成毯子又不如外国人织造的精良;而括号中的注解充分表明江津当地老百姓不懂得獭毛的营销方法,所以迫不得已寄到湖北去让别人销售,这里有营销经验的缺失,也有创新意识的匮乏,显示出他们对此商品销售

的无力感,其实也是当时重庆纺织服装业艰难境况的折射。又如《石柱厅乡土志》记:“丝为中国商务大宗,各省皆急力讲求,人未谙蚕纴丝诸法,出丝粗劲,仅城东三十里大河嘴场,岁约出丝千余两,由本境销行渝客寄售。”^{[2]67}由于当时石柱厅老百姓不精通养蚕纴丝的方法,当地所产丝质粗劣,而且生产区域狭小,产量较低,这是因技术问题导致丝织品的生产和销售困难。再如《江北厅乡土志》记录的棉织品销售情况:“棉花,本境偶有土花零散无莊,商人由楚购运本境,昔最畅销,近因纺纱盛行,商竞购纱,棉乃滞。”^{[6]187}这里明确指出当时江北厅的本地棉花生产滞后,由于“纺纱盛行”,商户们都竞相购买棉纱,导致棉的生产几乎停滞。

由上可知,重庆纺织服装业的销售困境充分证实了近代中国纺织业的发展趋势是已受到严重冲击的传统型手工生产模式逐渐被生产效率高得多的机器化生产方式及其纺织产品所取代。这样的内外交困其实也是转型升级的良好契机,但关键看当时政局是否稳定,当局政府是否重视。

三、深刻反映外国纺织服装业的经济入侵

由于西方各国率先采取机器化生产,其纺织服装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明显超过我国,给我国的纺织服装业带来巨大压力。当英国的棉纺织业进入到机器生产阶段后,中国手工棉纺织业在国际贸易和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便相形见绌。洋纱在中国销量增长的速度和势头非常快,引进洋纱代替土纱进行手工织布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洋纱便宜。^{[10]121}重庆自从被确立为通商口岸后,诸多列强沿江而来,倾销各类商品,谋取高额利润,其中纺织服装品就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严重影响了重庆纺织服装业的健康发展,当时重庆的许多乡土志都对此有所记载。《江津县乡土志》对此就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一曰洋货,大呢、洋布、洋缎、羽毛、茧纴 X 毡绒以及钟表各种玩器均来自外洋,上海吴淞进口,由长江运入销行处所三里皆有,惟县城较多,每岁约计值银四五万两。”^{[3]111}可以看出,当时外国列强向重庆倾销的商品中,纺织服装产品的种类最多,销售额也较高,对重庆本土纺织服装业的打击甚大。

洋纱洋布已经开始由沿海城市向远腹地扩散。19世纪90年代上半期,华中9个港进口的洋纱已占年输入量的27.38%,销往四川、湖南等省份。^{[11]760}因此,从重庆这些乡土志中所反映的主要纺织品的销售情况看,洋纱也在所有入境物品中的“岁销银”中金额最高,达“十万上下”之多,而大宗品棉花只有“约以万计”,传统高档面料绸缎的销量仅为万余两白银,更不用说如今的非物质文化产品夏布的销量了,那更是少之又少,仅“约以千计”,足见当时洋纱的市场销售比例最高,严重冲击了重庆传统纺织业。《石柱厅乡土志》记载:“洋棉纱多出湖北机器所造,专供织布,由渝客转运入境,复有由本境陆运售山后邻境者,岁共约值万余金。洋货,洋货为洋缎丝棉所织诸品,花样翻新,色亦各异,土人喜购者,其价较纯丝为廉,也由汉阳客水运入境,亦有自湖北陆运来者,岁销行几及万金。”^{[2]69}此文不仅说明洋棉纱的主要产地是湖北,而且在石柱厅的销售额较高,同时还说明用外国纺织原料所织造的“洋货”更受本地人青睐的原因是价格更为廉价。《万县乡土志》所记的“木棉,旧产甚旺,农家无不种者,每秋成后收花入市,水陆商贩以之行滇楚息大倍,与油米并销,自洋纱行令不旺矣”^{[8]4}更是直接点明外国洋纱对木棉生产的严重侵害。外国列强因技术更先进,收购重庆廉价的纺织服装原材料,再制作成纺织服装品,并以更高的价格返销本地,赚取高额利润,但本土民众只能用这些原材料生产简单的、传统的服饰品,获利甚微。其中,《江北厅乡土志》记有“鸭,本境多畜田中,以供食品,其毛与鸡鹅毛均贩售外洋,制成服物”^{[6]183},《垫江县乡土志》也载“鸡,其毛西商贩之以为制造洋缎洋绸等材料。鸭,鸭毛西人贩之与鸡毛同用。”^{[7]2}二者反映当时江北厅、垫江县的民众根本没有利用家禽的毛来制作纺织服装品的意识,足见其观念和技术的落后也为外国列强提供了可趁之机。

当时重庆的大量乡土志所记载的信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重庆纺织服装业受到外国纺织服装业的严重冲击,究其原因,这与洋纱洋布机械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强、效率高、成本低紧密相关,而我们的纺织业还停留在人工操作、效率低下的发展阶段。因

此,重庆本地纺织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远远赶不上西洋所产。如《万县乡土志》就有记录:“蚕丝,有黄白二种,取丝性柔,现有求者其产视昔为盛,山农子妇多养之,饲业审病皆用古法,设盆纛丝有幽风遗意,然无专业,此者每岁约出丝二万余斤,不成大莊,故有利而微。”^{[8]3}此文就分析了万县蚕丝生产获利微薄的原因是“皆用古法”,即生产技术还停留在古代的落后水平。

在外来经济入侵严重的情况下,重庆有些县城的纺织业力图革新,这在该时期此区域的乡土志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如《铜梁县乡土志》就载“洋布,以洋纱用机器织成,文理稠密,不减外洋,所织出县转龙场。”^{[4]661}这里的“洋布”明显是铜梁本地人以洋纱为原材料,采用西方的织布机器而织造出来的,而且其质量比较高,不亚于外国的洋布。虽然外国列强对重庆纺织服装业的影响颇大,但本地民众中仍有一些纺织品生产者的资产相对雄厚,政府加大对其的支持力度,使其技术相对进步,产量和经济效益也相对较高。其中,《万县乡土志》就记载了万县两家种桑大户的相关情况,“桑,山家绕宅多种之,近年益盛,有文邓二姓,县资设蚕桑局,遣人四出多购佳种,植至数百万根,邻县争购不绝于道,其息数倍。”^{[9]4}万县文邓两家种桑大户所购的桑种优良,且所种的桑树数量达数百根,因此其质量好,周边各县竞相采购,进而获利丰厚。有的纺织品生产者是以相对较好的技术和产品质量保障了其在纺织产业中的较高地位,如《铜梁县乡土志》就谈到“布扣,以斑竹与棉线造成为织布,必需之器,本境惟卢姓一族居奇”^{[4]660},这说明铜梁县的布扣作为本境的必需之品,仅仅卢姓这家的最好。面对纺织服装业的技术落后、质量低劣的窘境,当时的重庆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整改措施,如《江北厅乡土志》就载有:“桑,本境原有条桑、刺桑,俱可饲蚕,近又远购浙桑,分布各乡,依法种植,并开桑场种菴,期于广传。”^{[6]185}清末江北厅政府通过购买浙江的优良桑苗,责令各乡种植,希望借此推广、发展蚕桑业。即便如此,落后的生产方式终归要被历史淘汰,历史的发展潮流将无法逆转。

四、结语

乡土志原本是清末政府掀起的爱国救亡运动中开展乡土教育的教材,继而,民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国情继续贯彻乡土教育,也责令各级部门继续编撰乡土志。由于当时的大多数编撰者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以旧方志为蓝本,增加了富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新内容,这些信息弥足珍贵,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研究区域历史经济文化的一手资料。重庆当时出产的乡土志数量较多,所载信息较丰富,总体质量较高,对清末至民国时期的重庆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选取传统社会的重要产业之一纺织服装业作为研究对象,梳理重庆各地乡土志的相关信息,发现当时重庆该行业的发展概况和基本趋势。以此为基础,探寻以乡土志为基本材料,开展区域产业经济研究,分析其中的现象和规律,不仅可以总结出乡土志中区域产业经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还可为其他方面诸如艺术、文化、民族等主题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参考文献:

[1] (清)武丕文,修、甘桂森,纂.云阳乡土志[M]//姚乐野、王晓波.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成都:巴蜀书社,2009.

[2] (清)杨应玘,谭永泰,刘青云.石柱厅乡土志[M]//姚乐野、王晓波.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成都:巴蜀书社,2009.

[3] (清)佚名.江津县乡土志[M]//姚乐野、王晓波.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成都:巴蜀书社,2009.

[4] (清)夏云程.铜梁县乡土志[M]//姚乐野、王晓波.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成都:巴蜀书社,2009.

[5] (清)佚名.南川县乡土志[M]//姚乐野、王晓波.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成都:巴蜀书社,2009.

[6] (清)佚名.江北厅乡土志[M]//姚乐野、王晓波.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成都:巴蜀书社,2009.

[7] (民国)陈忠良、李炳灵,撰. 垫江县乡土志·格致[M]. 庆文华印馆代印, 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8] (清)佚名. (民国)万县乡土志·卷八[M]. 嘉忠印刷馆印行, 民国十五年(1926)石印本).

[9] (清)周宪斌. 巫山县乡土志·卷三[M]. 天放阁稿纸(光绪三十二年稿本).

[10] 赵津. 中国近代经济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11] 汪敬虞.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注释:

1 原文的“木”字旁在此字的左边,而《说文解字》注解为:“(槩)山桑也。释木曰。槩桑、山桑。大雅毛傳曰。槩、山桑也。禹貢槩絲。史記槩作舍。同音假借字也。從木。厭聲。於?切。七部詩曰。其槩其柘。”这大概是《南川县乡土志》编者笔误。